



日照得日光初照之先,其山最早苏醒,也会最先吸引北宋大文豪苏轼的目光。

生性爱山水的苏轼,对日照一座山的偏爱是从一座台开始的。

熙宁八年(1075)正月。一场大雪飞舞了一夜,掩饰不住兴奋的密州知州苏轼凌晨早起,清扫已经残破不堪的古旧城台,接连吟出《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并激情挥毫,写下“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

这是苏轼在密州任上,第一次有文字记录的静心观景观山。观的是漫山遍野的雪景,看的是马耳山状如马耳高高竖立的“两耳”巨石。

在上一年的九月,时年三十九岁的苏轼罢杭州通判,离开宋仁宗诗赞的“东南第一州”杭州,赴任他后来赞为“山东第二州”的密州。

这是苏轼第一次做地方主官,十二月三日到任后,便以“致君尧舜”之壮志,关心民瘼的情怀,紧锣密鼓地在“带山负海”的“持节之邦”,主理琐碎的地方行政事务。

苏轼上任后,治蝗灭虫,奏章惩凶,剿匪除患。一番忙碌,翻过了年的山头,像是跃过了火熏汗浸的高坎,在喜气蒸腾出一马平川视野的正月,迎来了他人密后的第一场大雪,也拥有了就任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休闲与浪漫,才有闲登台,有心观山。

苏轼在北台第一眼望见的醒目“双尖”,即《水经注》所载“山高百丈,上有二石并举”,海拔706米的马耳山主峰,它属于现今日照市的五莲县。

苏轼当年笔下的雪景,分属如今日照市和潍坊市诸城市。当时密州的治所在今日诸城,管辖地相当于现在的诸城、高密、胶州、黄岛、安丘、莒南和日照全境。

正如明万历年间日照名士厉曾言:“熙

在马达加斯加的密林深处,阳光透过叶隙洒在湿润的苔藓上,光影如碎金般跳动。一只拉波得氏变色龙缓缓睁开双眼,它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它的世界很小,却色彩斑斓;它的时间很短,却注定要绽放出独特的光芒。

拉波得氏变色龙的寿命不过短短数月,这在自然界中几乎是一个叹息般的瞬间,可它步伐依旧缓慢,在叶片与枝桠之间丈量着生命的宽度。

它的皮肤绿如嫩叶,褐似枯枝,蓝若晴空,能够随着环境变换色彩。但那不是单纯的伪装,而是它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它的眼睛可以单只独立转动,一只凝视远方,一只关注近旁,仿佛同时活在过去与未来。它耐心等待猎物的出现,舌头闪电般弹出,准确捕获那只毫无察觉的飞虫。

这迅猛的爆发,是它生命最为绽放的一刻,而在其余时间里,它更像是沉浸在沉思的方向,叶的脉络,以及阳光如何在午后悄然倾斜。

雨季的森林潮湿而喧闹,蛙鸣与虫声交织成一首永恒的自然交响曲。拉波得氏变色龙在这旋律中行走,偶尔停下脚步,似乎在倾听命运的低语。它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将在哪个黎明戛然而止,但它依旧用全部的热情,去拥抱每一个日出与日落。

在繁殖的季节,雄性变色龙会展现最鲜艳的色彩,仿佛将一生生的光与热都倾注在这一刻。雌性受孕后,会找一处湿润的土壤,小心地掘坑、产卵,轻轻覆盖。它不会等待幼龙破壳而出,因为它的生命已接近尾声。它只是静静地离开,将希望留给自己的孩子。

当秋风掠过森林,它会在某个温暖的午后,选择一片阳光充足的叶子,安静地闭上双眼。它用自己的方式,体验了生命的全部美好。人类常感叹生命的短暂,而拉波得氏变色龙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正如夜空因流星的划过而更加璀璨,生命也因有限而显得弥足珍贵。

我们无法选择生命的长短,却能决定如何度过每一天。因为生命,不仅仅是活了多少日子,更应该是记住了多少值得回忆的日子。每一天,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回忆。

当我们抱怨时间匆匆,不妨想想那只在密林中缓缓爬行的变色龙。它没有钟表,没有日历,却能在有限的光时间里,从容地欣赏世界的每一个细节。它教会我们,放慢脚步,感受今天,珍惜一切。

人,既要为自己活着,也要为别人活着。让理想,让信念,让美的观念,沐浴我们的人生。生命如同一趟列车,终点早已注定,重要的不是旅程的长度,而是沿途的风景,以及我们看见风景时的心情。

拉波得氏变色龙用它短暂而绚烂的一生,诠释了生命原本的意义:分清黑暗与光明,理解恨与爱,懂得好与坏,知道丑与美,明白失去与得到,才能充分体现生命的价值。

或许,当我们学会像拉波得氏变色龙一样,坦然面对有限的生命,珍惜每一个瞬间,我们的生命也会如它的色彩斑斓,即使短暂,也足以照亮自己,温暖他人。那么,当我们回首时,就能微笑着不再抱憾生命的终结。

诗词歌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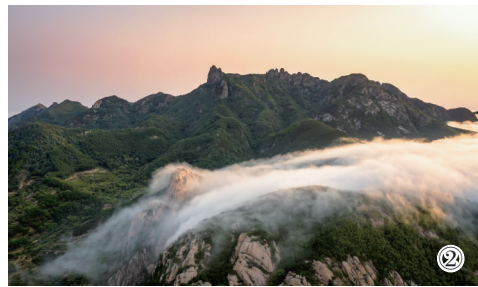
北台远望:苏轼的马耳山

图文 彭桐

与密,固同土而其景也”“泽流下邑,海曲桑麻,百世安堵,皆其遗爱”。苏轼在北台上尽情遥望的马耳山,寄寓了丰富的情感和迷人的内涵。

在此台一站,朝此山一望,苏轼打开了在密州观山、游山、写山、乐山的大门,一颗心也由此走向了至真至纯的辽阔天地和超然之境。

同年同月,苏轼把南边更远的九仙山也深情遥望了。他在和诗中给朋友段绎说“南山有佳色,无人空自奇”,还告知“草木变芬菲”。这座“南山”,就是他后来盛赞“奇秀不减雁荡”“今已压京东”的九仙山。



在依次南望了马耳、九仙两山,并分别吟诗两个月后,熙宁八年三月,苏轼不再耿耿于怀相比杭州的“城中无山水”,而是拉着州学教授章传道等人,去攀登东边的距北台约四十里的卢山,并与章频频作诗唱和。

苏轼不仅向同行晾晒“莫笑吟诗淡生活”的平常心,而且反复抒发其不受约束的“野性”,这其中就隐含了萌芽“超然物外”的情愫:“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

他渴望如鱼得水的自由。他这匹在“陋邦”经受风吹雨打的“幼”马,即将被东武神奇的山水锻造成桀骜不驯的野马。

仿佛,马耳山这匹沉寂已久的山石野马复

夏日的热浪如无形之网,密布天地。此时,“入清凉境,生欢喜心”八字如清泉沁脾。此清凉非避暑之术,此次喜亦非浮世浅笑,乃是身离尘嚣,心超物累之真境。

魏晋高士携酒寻幽林深涧,左思《招隐诗》云:“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幽涧之凉胜丝竹靡靡,山风的自然清凉胜过人工扇摇。更有唐时“自雨亭”,水激轮转,飞流四注,檐溜如瀑,暑气顿消。然此皆外物所借之力,终非心灵安顿处。

真正的清凉,源于心静。《定真玉篆》云:“常当晏居,静处思真,安身定气。”白居易消暑诗曰:“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静室空心,方是驱热根本。《维摩诘经》言:“心净则佛土净。”此清凉境岂非心造?摇扇亦成风,静坐亦生凉,息心即是避暑,无求自得清凉。

今日之人,徒待空调冷气,身虽处清凉之境,心却未脱尘嚣纷扰;冷风吹拂之下,仍被

来龙去脉



文化不灭,中国不灭。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一群中国文人用笔杆子撑起民族的精神脊梁,在文化阵地上守护着中华文明的不灭薪火。

中央电视台一套近期播出的电视剧《阵地》,将叙事重心聚焦于素有“文化抗战堡垒”之称的桂林,展开一幅不同以往的新异的抗战图景。

该剧选择了国内影视较少单独深入挖掘的“文化抗战”作为核心叙事,这使它在众多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独具匠心、另辟蹊径,不仅实现了题材层面的创新突破,更完成了一次深入历史肌理的精神寻根。

《阵地》通过再现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盛况,让观众看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汇聚在桂林的中国文化人在艰难条件下传播文化,抚慰民众,动员抗战,重塑了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

笔墨刀枪,文心长城。精神力量的兴衰与强弱,直接关乎民族命脉的赓续与传承,这使得文化抗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次要战场,而是一个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根本性问题。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李克农、夏衍等中共文化骨干南下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复刊《救亡日报》,广泛团结百余位文化、教育、艺术界精英,以笔墨为刀枪,以作品为枪弹,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用文化与信念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精神防线。

《阵地》以浓墨重彩的笔触,熔铸了精神意志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深刻主题。剧中,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得知有许多贫民在日机轰炸中家破人亡,以致绝望自尽时,一语道

活了,而苏轼也似乎想借助卢山之隐而“羽化成仙”,成为一匹真人版的良驹,好让两马交心,与另一个我对话。

在卢山纵情放飞心灵时,苏轼有感于秦博士卢敖“避难此山遂得道”。在探访卢敖洞后,他纵笔挥写《卢山五咏》,勾画了连屏山水图,赞美了“无人还自洁”的卢山。

后来,他又在《超然台记》中,提及自己多次由此山马耳引起看卢山等山,并点明对归隐东武的卢敖之念:“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

游卢山,是有据可查的苏轼到密州郡城后的第一次登山,也是他继北台看马耳山后的又一次极限自我释放。

苏轼看山及与山相关举动接续上演,每次都是主角,每次演绎都很精彩。

以现代人的思维想象,苏轼好奇的目光,简直像是智能摄像头。在向东聚焦卢山后,又扭转方向,转到颇为钟情的南方,像使用长变焦,由远拉近,扫描一番马耳山,又聚焦在南边距北台最近的常山。

这常山可是苏轼的自然观和民俗观的绽放之地,也是他从政为民情怀的见证之山。

常山因有“常德”而名,也是苏轼常去之山。在北台深望马耳山一眼后的第四个月开始,至熙宁九年(1076)九月,有文字记载的就先后五次到常山,且每次皆写《祭常山祝文》,而成为历代密州地方官祭常山求雨文献留存最多的人。

在熙宁八年四月,首次率队祈雨得应,苏轼还写有《次韵章传道喜雨祷常山而得》《祭常山神祝文》等,因相关作品数量多而内容丰富,被认为密州乃至齐鲁诸山中,常山最受苏轼青睐。又因他曾言“蝗独不生”“归功于神”,常山被认为密州境内最具“山灵之光”。

剑胆琴心

入清凉境

杨福成

功名所驱,为俗所役,心焦神灼。此身凉而心热之态,恰如《菜根谭》所言:“热不必除,而除此热恼,身常在清凉台上。”

王维《山居秋暝》描绘的正是此境:“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雨后的山林宁静,明月透过松枝洒下斑驳光影,清泉在石上叮咚流淌,如交响乐般心旷神怡。四十岁后的王维淡出官场,隐居终南山,方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任凭春华已逝,秋景最令人流连。

以文化抗战捍卫民族不屈灵魂

刘金祥

破了精神防线的至关重要性:“若此类悲剧一再上演,恐怕无需日军来攻,我们自己便已从内部瓦解了。”

同样,当《救亡日报》刚刚复刊,其印刷厂便被敌机炸弹摧毁,一些机器化为废铁,弥漫在报社上下的低沉士气更甚于战火硝烟。面对此情此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提醒众人:“一次轰炸便让大家垂头丧气,岂不正中敌人下怀?”

《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的大声疾呼则更为振聋发聩:“报社的房屋塌了,可以另寻他处;机器毁了,可以重修再购。但我们的抗战意志,绝不能被这几枚炸弹炸垮!”

电视剧《阵地》正是通过这一个个重要场景和关键人物,深刻揭示了精神长城之于民族存亡的支柱意义。

诚然,在烽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下,文化与教育事业难以正常发展。然而,电视剧《阵地》生动地向观众揭示: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与坚强领导,以及一大批爱国文化人士在危难中的坚守与支撑,才使得桂林这座战时的文化城池,在硝烟弥漫的危险境遇里,不仅没有沉寂和退守,相反迸发出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电视剧《阵地》中最为动人之处,莫过于展现民众如何在文艺的鼓舞下,重拾信念、凝聚力量。

在榕城饭店的大厅里,诗人艾青为几位刚穿上军装的青年战士朗诵他抵达桂林后创作的著名诗作《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深沉悲壮的诗句,叩击着每个人的心弦。

随后,年轻音乐家李凌带领众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愈唱愈响亮,连街边的行人也驻足聆听,最终汇入这澎湃激昂的合唱。

在阴暗潮湿的岩洞中,躲避日军空袭的民众面带忧惧,气氛凝重低沉,而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则以清亮的歌声驱散恐惧的阴霾,更带动大家动手清扫岩洞,在困境中重建秩序与希望。

得益于教育家陶行知 的号召与倡导,桂林大力推行“岩洞教育”,空袭警报声成为上课的钟声,幽深的洞穴化作传授知识的课堂。孩子们的琅琅书声,比敌机的轰炸更加

看诸山,看出诸多绝妙之山的缘起,在于北台南望马耳。

也许,苏轼以其天才之眼与绝世智慧,感悟了登台看山的玄机与奥妙。后来,他把北台打造成了超然台,并让“时与登览,放意肆志”遍观诸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那块并不算大,也貌不惊人的陋台,成了世人皆知的神奇之台。他所观览的山,也相继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山”。密州的山水风景线,自被仙一望之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蝶变。

回望当初,苏轼于清晨轻登台上雪,继而登台,静静远望马耳山的“双尖”,是多么难忘而富有意义的一瞬。不仅让日照五莲的“双尖”,有幸成为颇具中国文化色彩的山之主峰,也让这座鲁东南第一高峰,被命名为“苏东坡的马耳”。

这会让每一位来到日照的人都欣喜异常,或有循着马耳游遍日照诸山的向往。我在夏天初次来日照的第一天,满眼是高耸的楼群,还没看见山的半点影子,就生发了这个念想。

在这个滨海之城,吹过你吹的风,赏过你赏的月,就有了更多的日思夜想。

①马耳山主峰马耳峰②密州八景之“马耳腰云”③山水阳光



尘世浮华,但总有一处安放灵魂,不必寻找,只要让心安静,在最高的心之山顶眺望,看而不言,拈花之间绽放。

修心至最高境界,便会身心俱忘,到清凉之境,自由之境,心无一物,了无尘埃。正如叔本华所言:“生命就是一团欲望,得不到就痛苦,得到了就无聊。”智者看透本质,主动跳脱——人得清凉境,方得内心长久欢愉。

东坡于酷热道中忽悟:“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烦恼顿消,酷暑亦化林下清风——此真是“歇心”之妙谛。心若得歇,则无处非清凉境,意若得安,则无时无刻生欢喜心。

捻一缕清风,把忧伤推开,让心带着芳草的绿意,感受大自然的气息。掬一杯淡茶,品心灵温度,将心放逐,在微笑中淡然。

陌上流年,且吟且行,不去在意纷扰,不去忧虑明日,放下一切执念,素心如简,待莲花开尽后,便是清欢。

传奇

眼泪,一种弱酸性的透明无色液体。但它并非寻常的液体,因为情感的发酵,它可能有着惊天动地的力量。

作家苏童眼中最不寻常的眼泪,无疑是孟姜女的眼泪。他为此写了小说《碧奴》,讲述“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眼泪是一种悲伤到底的力量”,他把孟姜女誉为“眼泪之神”。

两千多年前的秦帝国,寒风凛冽的深秋,善良痴情的孟姜女历尽千辛万苦,为在北方筑长城的丈夫送棉衣。当她千里迢迢来到长城,丈夫已死,而且被深埋于长城之下。

此时的孟姜女悲痛欲绝,她手扶长城,失声痛哭,七天七夜不绝。她眼中的泪水,让白云停步,百鸟噤声,海潮翻滚,八百里长城为之崩塌,露出了丈夫的尸骨,孟姜女也因悲痛投海殉夫。

孟姜女的眼泪,是忠贞的爱情之泪,充满着对爱的牺牲精神。她的眼泪,也是对于苦难、压迫与生存不公的反抗,是柔弱战胜刚强,是爱战胜暴虐的至高境界。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著名的眼泪故事。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项羽遭遇十面埋伏,四面楚歌,上演一场霸王别姬的悲剧,“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杜甫得知官军平定蓟北写就“初闻涕泪满衣裳”。他们或为忧国忧民而泣,或为个人命运的悲剧而哭。

但是最让我震撼的,是孔子的眼泪。《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负欠逍遥于门,曰:“赐。如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蓐乎!”因以涕下。七天之后孔子去世。

孔子的“临终歌哭,涕泗横流”,两千多年前重病缠身、老泪纵横的那一幕,让人不禁动容。孔子的眼泪,并不是宣泄自身即将离世的悲苦,而是肉体消失后信仰与理想传承的忧虑。

孔子临终时饱含着泪水,他痛楚于礼坏乐崩,圣人绝学无继,克己复礼的事业未能完成,更渴望着短暂生命信仰的永恒延续。

孔子的哭“着眼于生,不在于死”“着眼于天下,不在于己”。孔子用眼泪铸就了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牺牲品格和深沉信仰。孔子的眼泪让人懂得,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精神可以永恒。

孟姜女和孔子的眼泪,前者是民间女子之哭,后者是至圣先师之泣。

孟姜女是哭心爱丈夫的罹难,哭秦始皇的暴政;孔子是哭事业未能竟成,哭自己的思想何以传承。他们的哭泣深藏了彻底的牺牲精神,也因为牺牲,他们演绎了穿越历史的永恒价值和巨大力量。

北宋“饭局门”:进奏院案

流沙江

进奏院案是一桩发生在北宋,由官员们公款吃喝引发的大案,也可以称之为北宋的“饭局门”。

进奏院是宋代集中处理各州镇地方官员奏折的机构,上呈皇帝,下达地方,从事公文流通之类的工作。庆历四年(1044)秋,一年一度的赛神会如约而至。此时苏舜钦“监进奏院”,也就是担任进奏院的院长。

进奏院组织的赛神会饭局,参加者有太常博士周延隼、殿中丞王休复、集贤校理王益柔等十几位官员。有意思的是,“太子中舍李定愿饯酬会,而舜钦不纳”,即太子的属官李定也想参加这个饭局,但苏舜钦不让他来。

李定感受到了羞辱,“遂謗謗于都下”。也就是说,他随即在京城对进奏院的饭局和参加饭局的人肆意诽谤,大加指责。

那么,苏舜钦为什么要拒绝李定参加这个饭局呢?

李定是晏殊老婆的隔房堂兄弟,苏舜钦则与欧阳修关系密切,志同道合。欧阳修写过一首长诗《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前半段说奸邪用事,瘟疫横行,最后一句则是“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讽刺、挖苦晏殊之意溢于言表。

而在范仲淹“庆历新政”变法时,晏殊是守旧派,欧阳修则是改革派。两人师生交恶,欧阳修甚至还说晏殊“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就是因为双方三观不同,苏舜钦才严词拒绝了晏殊的隔房小舅子李定参加饭局。

很快,守旧派的御史中丞王拱辰便知道了这件事。他了解到,集贤校理王益柔在饭局上作诗《傲歌》云:“醉卧北榻遣帝扶,周公孔圣驱为奴。”于是上奏宋仁宗弹劾苏舜钦等人,其罪状主要有:抵充先圣,冒犯了先贤圣人;监主自盗,苏舜钦将进奏院中的废旧纸张卖掉换钱,并用这些钱组织了这场饭局;另外,还有召妓取乐等情形。

北宋时期,这些罪状每一条都是重罪。例如“监主自盗”,比一般的盗窃行为罪加二等;而“抵充先圣”更严重,王拱辰说:“益柔作《傲歌》,罪当诛。”事到如今,这件饭局案的背后已经有了明显的党派痕迹。

果真不然,改革派的枢密院副使韩琦站了出来。他对宋仁宗说:“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而攻一王益柔,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大意是说,王拱辰等人猛烈抨击王益柔是别有用心。

作为“庆历新政”最大的后台老板,宋仁宗也意识到,这已经不是请客吃饭的事了,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从轻发落涉案官员。作《傲歌》的王益柔,“监屠羊税,并落校理”,降为州的税务官;苏舜钦“除名勒停”,也就是开除公职;……王拱辰则兴高采烈地到处炫耀说:“吾一举网尽之矣。”

进奏院案后,“庆历新政”的主力军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三四大臣罢去,天下事卒不复施为”。也就是说,此案间接导致了范仲淹轰轰烈烈的改革草草收场。而苏舜钦则跑到了苏州,买地筑沧浪亭自居。此举被称为北宋文人的“诗与远方”,而欧阳修的两句千古绝唱“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更使“沧浪亭”名声大振。